

外国图书馆藏书补充方面的一些問題*

Ю·В·果里戈利耶夫

图书馆藏书补充是现代最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几乎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都在从事解决它。

了解外国图书馆藏书补充的经验，对于苏联图书馆员是很有兴趣的，有可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结论。

苏共中央“关于全国图书馆事业现状和改进办法”的决定（1959年9月），指出苏联图书馆藏书补充方面的严重缺点，并指示克服的方法。

毫无疑问，苏联图书馆员光荣地执行着党的这个指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来最合理地解决藏书补充这一复杂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学家们对于藏书补充合理化的悲观情绪，在我们的图书馆员中是绝对没有的。例如，英国图书馆学家帕弗特以科学图书馆藏书补充专业化理由写道：“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能制定有效的合作，而按照这种方案是可以使图书馆藏书补充方案合理化的”。瑞典图书馆学家格林提出正确的论题，认为图书馆员——图书补充工作人员应当予见到读者——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并预先把他们可能需要的图书纳入馆藏，其结论是：“这样的目的，我们力求达到它，而对我们来说，它将永远是不可达到的空想”。

这样的言论，不胜枚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建立图书馆，当然要发生困难情况的。其中很多问题，在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家们看来都是空想，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却已付诸实践。

在选择图书中，我们懂得现代各图书馆藏书补充的原则基础。而这个原则基础是反对那种多年来占着统治地位的理论——图书馆藏书补充的详尽无遗的完备性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科学图书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其藏书补充应当包括一切国家和一切文字的各个知识门类图书，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备性。这个理论是在靠近十九世纪中叶时，由英国博物院院长A、潘尼茨提出的。那时，这个理论受到按其规模列为美国第二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的

馆长希伯列姆的支持。

我们可以骄傲地指出，1889年俄国杰出的美术家——批评家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B·B斯达索夫在其“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论文”一文中^①，主张补充图书要维护严格的选择。他绝对排斥如下的说法：“国家图书馆，作为全国的中央书库，应当是完备的，也就是在书库内应当包括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文字出版的和抄写的一切原本或副本图书……”。“谁也不会这样设想，——他写道，——……并且这在物质上也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何况还有那些完全不需要的和有害的书笈。欧洲的大多数图书馆都充满了没用的废物……并且不知道怎样来打发它”。

现在不能有两种意见，在出版物巨大增长的情况下，国家范围也好，世界范围也好，藏书补充之详尽无遗的完备性，不仅在综合性的国家图书馆，甚至在专业性的图书馆也是办不到的；这样做，只能因减少价值的出版物而造成藏书的混乱，同时也会使服务读者、图书编目、目录管理和藏书保管等工作发生困难。

为此，藏书补充的相对完备性的问题代替着详尽无遗的完备性的问题而被提了出来。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是：每个具体图书馆，不管它属于什么类型，其藏书补充则必须具有最大限度的藏书数量，这些藏书按照图书馆的这个或那个特点，真正是为它所必需的、好的、重要的图书，是按照图书馆的类型、专业、任务以及服务读者的机构而选择的图书。因此，藏书补充完备性的程度，应当按图书的各个部分和具体图书馆藏书每个部分的比重而严格地加以区分。

每个图书馆在图书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

* 这篇文章是苏联列宁图书馆图书馆学目录学科学方法部编印的第6辑“外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序论。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供我国图书馆工作者研究的。——译者。

① 这里说的公共图书馆是指“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而言——译者。

不是仅仅根据这个而决定，与其說由其藏书的規模大小来决定，不如說由藏书的质量、由利用目录和目录片之善于揭露全部图书财富、由采用积极的形式与方法来区别对待讀者和满足其要求来决定。

这种新的思想，已經被許多外国的先进图书馆学家所認識到。如雷斯（捷克斯洛伐克）就号召图书馆員拒絕那种“胸襟狭窄”的补充原则，这种原则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死藏书”。他絕對反对那些陈旧的論調：“所有进入图书馆的书都应登在登記簿上，所有登在登記簿上的书，都应（永远地——作者）留在图书馆里”。按照他的意見，图书馆的意义，現在不是由冊数，而是由图书馆讀者工作的範圍和效果来决定。

十分明显，选择图书完全是以图书馆类型以及它的任务为轉移的，經過选择而构成的藏书，决定着图书馆的政治面貌。所以认真地談到选择图书的方法，只能是预先确定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說，为了解决一种什么样的任务，图书馆員应当把一些图书采入到自己图书馆藏书中去，而对另外一些則加以拒絕。

資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学家們，用图书馆和图书馆科学的“客观性”和“无党性”的资产阶级理論加以掩盖，避免揭露自己图书馆的真正任务，局限于不大清楚的模糊的說法。因此，他們也就力避明确地表述各种类型图书馆选择图书的基本原则。例如列登巴赫尔（西德图书馆学家——譯者）认为，不管各种类型图书馆的任务与使命而确定选择图书的原则，也是可能的。

苏联图书馆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在苏联图书馆工作中永远坚持着共产党党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根据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关于这个問題的公开和明确的指示而規定的。党性的原则成为藏书补充的基础，并首先在选择图书和积极利用图书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人民民主国家的图书馆学家也是这样的立場，他們公开承认，在图书馆的經常工作中要解决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例如，1958年11月施瓦尔茨（民主德国图书馆学家——譯者）在阿尔登貝尔赫市举行的藏书补充理論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民主德国各普通教育图书馆的面前摆着一項任务，就是促进讀者社会主义觉悟的发展以及他們的一般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施瓦尔茨

說：“藏书的迫切性取决于它們有利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的政治和經濟任务解决到什么程度。为此，在为图书馆藏书选择图书时，就要考虑到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教育使命……首先是根据书籍的内容，它的政治方向和对讀者的影响”。

选择图书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对藏书补充的限制，是同讀者对图书的不断增长和日益复杂的要求相矛盾的。怎样来解决在科学图书馆也好、大众图书馆也好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这一复杂的矛盾呢？

既然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能靠自己的藏书毫无例外地来满足讀者的要求，这就使得为了一个图书馆讀者有可能使用另一图书馆藏书所采取的一整套措施逐渐复杂起来。在这些措施中有：館际互借（国内的和國際的）的組織，联合目录的編制，图书馆所必需的本国和外国书籍补充的協調。

这样一些事情，不是通过一个图书馆，而是通过若干图书馆的合作一致的行动才能实现。其结果，图书馆的合作就代替了旧的或多或少地处于孤立地位的綜合性图书馆而突出来了。未来的“統一的”图书馆将被确定为图书馆体系，它将按着統一致的計劃来执行一系列的重要工作。

列宁不止一次地对苏联图书馆学家們，說过这种“統一的图书馆网”的思想。这种思想同样在人民民主国家也得到生动的反响和效果。

雷斯強調說：“服从統一体系的認識，应当貫穿到我們图书馆的全部活动中去，所以不是个别图书馆本身，而是图书馆作为集体的成員，这才是未来的图书馆”。

应当說，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图书馆工作的協調問題是以另外一种原则立場来解决的，它們在實踐中被十分广泛地采用着，并在刊物上积极地討論着。

資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广泛利用着館际互借，編制着联合目录；为了藏书补充的協調正在做着图书馆的各种联合。在本論文集②上发表的論文中，所有这些在各国实行的措施，都可以找到詳細的介紹。但是，注意地了解了它們之后，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都已具备着所有的先决条件，可以成功地发展其藏书补充工作的各种協調形式，而資本主义国家在这方

① 指“外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第6輯——譯者。

面的可能性却受到限制。例如，关于四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所謂“斯堪的那维亚计划”）的图书馆藏书补充协调的谈判已经继续十年左右了，但是它的实施日期依然是渺茫的。这个计划的设计者表示担忧，由于来自大专院校图书馆方面的不可避免的阻力，这个计划不能包括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它们怕对它们的“自治权”受到各种外来的侵害；同样，各种工业企业和联合的图书馆，也都尽力对其对手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

藏书补充协调之复杂化，还在于许多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家对大型综合公共图书馆估计不足，并试图使它与各专科的图书馆对立起来。

对综合图书馆的“不平等待遇”是按照几条路线来进行的。英国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法郎西斯发表了综合图书馆甚至可以“消亡”的意见；他强调这种类型的图书馆似乎不能保证按照科学技术各个专门部门来补充图书，不能十分完整地定购自然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杂志，拥有的熟练干部也要比专科图书馆少。

许多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家都赞同这种观点。例如格林就曾机械地将所有科学图书馆分为图书、档案馆（国家综合图书馆和专门的人文科学图书馆）和主要是以新书服务读者的图书馆，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图书馆都是属于后者。列登巴赫尔则强调说，专科图书馆应当把那些部分的任务放在自己身上，这些任务本来是国家图书馆自己在藏书补充方面所应承担的，而由于它们的综合性，这些任务就不可能被完成。

这种立场同我们对于各种类型图书馆在为国家服务方面的作用与地位的看法，是显然相反的。图书馆的一种类型对另外一种类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密切合作——这就是苏联图书馆体系的主要特点。可以提到，甚至综合各科的州图书馆，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门图书馆，也已建立了密切合作。

这里再转过来看看图书馆在藏书补充与利用方面的共同工作的各个形式，我们首先讲到那个完全有益的，并且是在实践中已经证实了的措施，如馆际互借。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来歪曲作为图书馆互助手段之一的馆际互借的运用思想，和怎样滥用它来破坏基层图书馆藏书补充本身的基础的。

特别畸形的是出现在西德的现象，在那里，按照西德图书馆员们的意见，馆际互借过分热烈的发展，将有消耗科学图书馆的工作的其他部分的危险。

由于不适当地利用馆际互借的结果，遂使基层图书馆缩减了自己的藏书补充，且合并了它们的各部分。与其说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藏书，不如说他们习惯于用较强的图书馆的藏书。其结果，馆际互借破坏了图书馆藏书补充的基础，丧失了自己藏书的必要的完备性。

我们再来谈谈英国，这里可说是地区图书馆体系的诞生地，这种体系是由各种类型图书馆（市的和州的中央图书馆、许多科学图书馆）按照地理原则（在自愿基础上）而联合起来的，并且通过馆际互借来共同使用它们自己的藏书。

现在，英国图书馆藏书补充的合作，就是在这种地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图书馆的学科专门化乃是它的基础。这样的体系，使合作的图书馆中每个图书馆藏书的学科专门化互相配合起来，从这一点来说，乃是英国图书馆建立服务体系的先进特点。

这个体系虽有其不容置疑的长处，但也有一系列的缺点。在这方面英国人自己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例如马克·柯尔文写道：“这个体系会导致各图书馆只买一些必要的图书，而经费不够的小图书馆将要为别的图书馆的需要而继续其微不足道和没有大用处的存在”。

这种观察，为马克·柯尔文提供了根据，来提出其关于图书馆藏书补充的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的思想。他说：“就在合作的好处中隐藏着危险，如果这种合作还不那么有效的話，所发生的危险还不会那么尖锐。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确定了适当范围，来限制合作的有效职能”。

正确地說，馆际互借乃是图书馆工作协调的形式之一，不能被看成为好像什么孤立的东西，它是图书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马克·柯尔文却对馆际互借在图书馆藏书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否定的评价。

从这种情况出发，马克·柯尔文以及后来同意他的列登巴赫尔，就都得出了必须缩小馆际互借的利用和增加图书馆藏书补充的拨款的结论。

他们的论证大致如下：

1、利用馆际互借，需要图书馆消耗不少经费

来支付寄书用的包装费和邮递费。同时，邮寄加速了因其他图书馆借用而送出的图书的损毁。

2、非常广泛地采用馆际互借，使借出图书的图书馆的读者工作变坏（增加本馆读者使用该书的拒绝率）。对于那些从别的图书馆借书的读者来说，则不得不因等书而浪费时间。

3、通过馆际互借来得到图书，不能改善图书馆的藏书，不能使本馆藏书的空白得到弥补，相反地，更使得这些空白保留下来。

所有这些论证，使马克·柯尔文得出结论：馆际互借应当只能被用来满足特殊的读者要求。

没有疑问，马克·柯尔文的这些见解，应当被承认为合理的：不能使图书馆藏书贫乏而去主要用馆际互借方法来服务读者，使之得到他们必需的图书。应当同意而且必须强调的，每个大众图书馆应当尽可能满足本馆读者的通常的和非专门性的要求，使用馆际互借只能是为了借到古老的图书，以及比较专门的本国出版物以及外国出版物。列登巴赫尔也强调这个结论，认为馆际互借对于最有效地利用罕用的和专门的图书是必要的。

但是，为了使馆际互借恢复其正常的职能，必须改善图书馆的物质状况，因为正是购书经费之不足，才使他们对馆际协作这一有效形式做了上述的曲解。马克·柯尔文和列登巴赫尔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地谈到这点，但也沒有否认这点。

列登巴赫尔写道：“在现在，这个事实（馆际互借的畸形发展——作者）是反驳不了的证明，多年以来用于图书馆补充图书的款数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那些拨款给图书馆的人们要因为当时实行节约而偿还图书馆的欠账了”。

在英国，那种情况也是造成图书馆藏书补充方面严重缺点的原因，就象马克·柯尔文客气地说：“拨款不够好”。资本主义国家不惜用钱在军事支出上，但是拨给图书馆的，只是一点点。

苏联图书馆工作的协调，谈不到规定什么范围。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众图书馆网和科学图书馆网，全苏联图书馆都有国家拨给的足够的预算，用以补充自己的藏书，因而，馆际互借的利用就成为辅助性质，因为图书馆是用自己的藏书来满足读者的大部分要求的。

看来，作为图书馆藏书补充工作协调的重要条件——联合目录组织方面的新趋向，也是由于给图

书馆藏书补充拨款上的缺点而产生的。

联合目录可以使各个图书馆补充图书更加合理，因为能够考虑到所有参加联合的各图书馆的藏书补充。并且提供可能来重新分配图书馆的藏书，以便保证一个方面藏书的完备性和更加积极地利用它们。

但是，为了这样，凡是新到的图书都必须进行统一的登录，才能很快地把它们包括到联合目录中去。因此，编制联合目录应当有组织地最大地节约在它上面所耗费的人力和经费。

马克·柯尔文根据这种理由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计划编制总的和地区的联合目录，首先要放弃它们的完备性。按照他的意见，那些可以想得到每个图书馆都应当入藏的书籍，就不应列入地区联合目录。同时，包括在伦敦的总联合目录中的本国图书，应当仅仅限于那些，例如，在各地区补充现时英文出版物进行地区协作之前所出版的图书。外文图书应当全部反映在国家目录中。

非常先进，而且值得赞同的是这种思想：不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叫做“必备书”的那些图书列入联合目录，这些图书是每个相应类型的图书馆都应当入藏的。但是不能同意的是那种意见，即所有本国的现时出版物不在国家目录中反映，因为地区图书馆的藏书补充不能贫乏和无人负责到那种程度：在它的藏书补充中仅仅收藏“必备书”。

图书馆藏书不断的增长和很大一部分图书很快的陈旧，特别是在技术、农业、医学、部分自然科学及其他等方面的图书，因此，摆在大图书馆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要组织好大量图书的整理、保存和利用。书库，起头估计可用十年，非常短的时期内就装满了，安排每年新进馆的图书是难上加难，目录扩张到几乎难于利用它的程度。所有这些现象，是为我們苏联图书馆所熟知的。苏联图书馆的藏书证明一个经验，就是它要远比全世界各国相应图书馆的藏书都增加得快。

其结果，在图书馆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即利用图书馆组织的特殊方法来保存有效的图书，也就是要经常不断地从陈旧了的、无关紧要的和多余的图书中来解决这些图书。不能不考虑到，出版物的陈旧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每个图书馆的部分藏书逐渐变成德国人所谓的“死书”。

还在1820年艾伯特就写道，在所有的图书馆

里，与真正的图书珍宝一起还有不少累赘。这种累赘的比重，要占当时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因此，一些外国的图书馆员都想从减少陈旧图书这一点来得到补救。但是，容特克绝对不同意这个非常的办法，他正确地指出：“往往一些不大重要的图书忽然会得到苏生，……图书馆员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图书。部分地减少图书，不是现状的出路。为了减轻藏书的负担，应当寻找别的方法”。

在现在，根据上述情况系统地来清理藏书中陈旧的、无关的、多余的出版物，还有另外一些足以减轻藏书负担的方法，这就是建立预备书库，馆际交换图书和重新分配藏书。

为了建立这种书库，往往要联合许多图书馆，共同组织各馆古老藏书的保存和利用。一些大的国家图书馆，可以为本馆藏书单独建立预备书库。组织和利用预备书库的经验，我们还很少研究，并且在我国也没有被采用过。苏联的科学图书馆的藏书增长得非常迅速，而许多科学书籍又陈旧得很快，在我国，为了建立那样的书库是有多种条件的。

当然，为了减轻藏书负担还有很多办法，重新合理分配藏书就能够减轻藏书的负担。在苏共中央“关于我国图书馆现状和改进办法”的决定中，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苏联图书馆的面前。

在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这个任务，自然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仅有很少的时候得到实际的解决。例如，巴黎国家图书馆所属专门委员会，试图有组织地重新分配巴黎各个图书馆的期刊和论文集，就不能认为是取得了什么大成就的。

众所周知，重新分配有自愿的，也有强迫的（按照政府的专门决定）。采用后者是很少的，而且主要是为了在国家图书馆里建立本国图书的包罗完备的藏书。有名的苏联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K.H.捷鲁诺夫，曾大力提倡过为在苏联国家图书馆建立本国图书完备无遗的藏书而进行这样的重新分配。现在，保加利亚就是想利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索菲亚柯拉洛夫人民图书馆搜藏保加利亚全部出版物的问题。

馆际交换图书进行得很成功。外国经验证明，为了最合乎理想地组织内部交换，它的严格集中是必要的。

在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注意大众图书馆的藏书补充问题是很显著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大众图书馆是为极其广泛的读者服务，促进文化的

提高和对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政治、经济任务的。

1958年在阿尔登贝尔赫市举行的藏书补充会议上，就试图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普通教育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承认，这个试验，整个说来是成功的。在会议上被审议的许多问题，绝不是狭隘的地方性质，它们对于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是迫切的、现实的。它们对于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者也是有兴趣的。

我没有可能注意全部那些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所谓“必备书”问题和科学、文艺书籍的补充问题。

“必备书”，可以被理解为对于那些必须入藏该书的图书馆是极其必要的书。书籍的思想和科学意义，是选择这些书的准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56年出版的“供普通教育图书馆用的预报目录”能够帮助选择这些“必备书”。

会议赞同“必备书”的思想，建议在期刊上组织对于它们的广泛和有效的评论，并认为它们应该列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出版计划内。

德国图书馆学家们正确地认为，“必备书”的选择，为各种类型普通教育图书馆经常供应足够册数的最有价值和最迫切的出版物，提供了可能性，在它们中间便于建立每个图书馆的科学、文艺书籍的核心，并有助于编制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标准目录。

在会议上，同时也是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里发生的问题，是关于普通教育图书馆补充科学、文艺书籍的原则问题。

按照会议报告人之一施瓦尔茨的意见，普通教育图书馆的藏书是统一的，而传统却是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这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因为这样就破坏了教育目的的统一性。藏书的这部分和那部分，每个部分在计划中都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

这个正确的方针，使得会议通过了各种类型普通教育图书馆补充文艺与科学书籍的大致标准：

图书馆类型	数量(百分比)	
	科学书籍	文艺书籍
区的	60	40
乡的	50	50
村社的	40	60

这个事实使人耽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好，特别是在波兰也好，可以看出在他们的大众图书馆工作中，对科学书籍的作用与意义，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而同时对文艺书籍的作用与意义也有些评价过高。

这种立场，可以在普通教育图书馆的藏书中文艺书籍所占比重过大这点上，找到具体的反映。

根据会议的材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平均有40%的图书馆，入藏文艺书籍占全部藏书的60—70%。按照谢克尔斯基的材料，波兰的大众图书馆购买文艺、少年儿童书籍有时达到80—90%，而科学普及的读物全部只有10—15%。其结果，这些藏书不能满足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读者的要求。这是其他波兰作者——德姆贝和那尔瓦施所指出的。

民主德国的图书馆员季里别尔贝赫解释文艺书籍不合理的增长有三个原因：新作品的大量出版；对于政治与科学书籍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上的作用估计不足；最后是一部分图书馆员认为文艺书籍好搞，科学书籍难办。

谢克尔斯基还补充一点，学校、无线电广播和期刊对于科学普及书籍的宣传差，而图书馆书架上保存着许多陈旧的和内容空泛的书籍，赶退了读者。正是这样，所以许多图书馆员把这些书看成“不可避免的祸害”。

没有疑问，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想一想，其主要原因首先还是应当在于许多读者和馆员的政治、文化水平不够高。不管怎样，对科学书笈估计不足，以及它在读者群众中没有足够的流通，总是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现在，在人民民主国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尽快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问题的解决，不当从削弱文艺书笈的工作中去找，而是应当加强图书馆对待科学书笈、科学普及书笈和学习用书的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提高图书馆员的技能。

最后，应当提到在波兰实行的大众图书馆藏书补充分散管理的经验。借助于这种做法，村（大的）图书馆的藏书补充的职务，被交给乡图书馆去做。这种做法是向前走了一步呢，还是后退了一步呢？

谢克尔斯基在1957年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现在任何人没有对这个措施提出问题……我们没有看

到任何的原则错误。”1959年他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分散管理有很多好处……大多数情况下各图书馆对自己的职务都执行得还好或大致好”。

同时（1959年）在那尔瓦施的文章中则直接地说：“不是所有的乡图书馆……都能够执行这个任务的；重点调查的结果，说明在藏书补充上是有问题和有缺点的”。

最后，德姆贝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1960年），提出了“乡图书馆和市图书馆能否执行交给他们的困难的任务”的问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其文章末尾却与他开头所说的相反，作者做出意外的结论说：“这个措施的显著效果在现在已经显明了”。

谢克尔斯基是肯定藏书补充分散管理的，那尔瓦施表示怀疑，而德姆贝则自相矛盾。

藏书补充分散管理制度，只能在书店就地很好地供应书笈的条件下才能有成功的发展。但是谢克尔斯基和德姆贝及其他人都说，书店图书供应工作不好。

图书馆员——图书补充人员要有高度的水平，并系统地给他们以业务技术上的帮助。但是德姆贝和谢克尔斯基都一致地说乡图书馆馆员的业务技能很弱，后者并列举乡图书馆员——图书补充人员的任务，公开地说：“不是所有的乡图书馆员都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就是在业务上帮助乡图书馆选择优良的科学和文艺书笈的事情，做得也不好。谢克尔斯基指出，对于某些读者群所需要的新书的价值和用处，缺乏有分量的报道。结果是，很多复杂问题不得不由乡图书馆自己来解决，对它又常常不能给以帮助，因此，它无力或很少经验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再加上上面曾经说过的关于对图书馆补充科学普及书笈问题的估计不足，以及其它等等，那么波兰的藏书补充分散管理的结果，不能被认为是良好的。这个制度没有任何长处，因而应当以国家的藏书补充集中制度来代替，以保证大众图书馆藏书补充工作的更高的水平。

（令承节译自《外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第6辑，第5—22页。）